

# “外发”型现代化及其特征

张 静

假如为着研究的方便，而用一个简单的划分，我们可以把各种现代化研究所表现出的思想方法归为两类。第一类强调现代化过程的普遍特征，把现代化说成是一付“现代溶解剂”，所到之处传统体制无不瓦解，社会经过变迁转型的动荡，发展出适应现代功能的新体制结构，逐步达到理性化、民主化、都市化、世俗化——即现代化的境界。这些总结，由于已被数个西方现代化先行国的经验所证实，自然有了令人信服的历史依据，因而在现代化研究的早期阶段颇得共鸣。第二类方法注重现代化过程的差异性，指出由于文化遗产的不同，发展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反映不同，使得它们的现代化不必去追求西方的单一模式，而完全可以在形态、途径上探索自己的模式。这一观念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中受到启发，因为人类学证明了西方社会的各种“现代性”并非来自于现代化的转变过程，而是可以从它的现代化前阶段，甚至更早的中古时期形成的传统中找到。由于诸多政治、文化因素的作用，这种解释似乎更能符合各种类型国家的情感及现实的需要，因而成为现代化研究后起的一个新“热点”，同时也是方兴未艾的国别比较研究立据的基础。

说明一个过程不是怎样的，比说它是怎样的要容易一些，现代化研究也是如此。把一部分现代化先行国取得的经验完全看成是可以推广的“一般”，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思路的天真，更何况这种做法还夹杂着叫人难以接受的欧洲种族中心主义色彩。自从西方现代化模式受到诸多第三世界实践的“反证”之后，相信世界各民族将以一种方式走向未来的幻想已被击得粉碎，理论家们抛弃了往日的错觉，开始承认特殊形态的现代化实践，这也许可以说是认识的一个进步。

但是，正如历史没有证明完全仿效某种模式（哪怕是已成功了的模式）能够取得成功一样，它也没有证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已成功的及未成功的）与发达国家的相似性比在现代化以前的传统时代更少了。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说东亚社会的现代化仅仅是由于受到了西方文化影响”<sup>①</sup>的话，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说它们的现代化起步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开始的。日本人承认他们的国家曾经历了一个模仿时期，“亚洲四龙”、中国、印度等地的发展同样无法排除外力的影响。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随着历史拉开近代的帷幕，古代、中世纪的文明多中心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整体经济体系逐步形成。无论是过去的殖民侵略与掠夺，还是当今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制约手段，都把世界各民族的生存投放在一个利益相关的体系中，它们被“捆”在一辆车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没有一个重要民族可以游离于这一体系之外，谁这样做，谁的

<sup>①</sup> 参见费正清等著《东亚文明史》第2卷：“东亚：现代转型”，1965年，第9页。

利益与发展就受到损失。这一现实对于具体民族的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它意味着民族独自发展的历史已成为过去,它同时还给民族发展创造了这样的条件:使各民族间共性增加的可能超过了减少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把现代化看成是世界性的、而不是某个民族自己的事件。对现代化的后来者来说,以这种眼界来看待本民族的发展,就必须承认任何现代化的探索都只能在影响、制约、甚至是模仿中创新,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现代化早发时期的国际条件,也没有200年前欧洲人移民北美大陆创立混合新文化的机会,更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所有新尝试都既不能超脱、也无法照搬以往的经验。

从这一角度审视现代化研究强调“同”或“异”的两种思想方法,挑剔一点说,不能不使人感到一种缺憾。前者无法解释西方模式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失败的事实,更没有意识到民族传统对于抵抗、转型或溶解“西化”的作用;后者则无法说明为什么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存在相当的共性。使现代化的共性与特性在某一国的实践中都有存在的基础,是发展理论大有事情可做的一个新课题。

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思想基础是19世纪的单线进化论和“进步”的观念,因而它的中心是承认一种发展逻辑——即西方历史已证明了的逻辑。这种理论提到了传播现代化,但并没有展开把它当作另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类型。现代化理论也注意到了不同民族的特殊性,但它认为必须改变这些“不同”后,方能为现代化在此民族的“起飞”创造条件。这一理论相信:只要具备了相同的条件,在西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会在这新地方重演一遍。

“依附”理论抓住了外力作用的思路,但只是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发挥了这一思路。它抱怨说本来它们发展得不错,而西方的介入破坏了原本正常的发展,迫使它们进入了西方未曾有过的叉道——依附发展的境地。办法当然是拒斥“介入”,摆脱“依附”,回到正常发展道路上去。看来,这一理论并不认为自己原来的正常发展与西方所走过的经历应该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依附论同现代化理论的真正分歧不在于现代化发展的自然过程,而在于西方介入的历史过程。

由此而生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传播发展是不是现代化的一种自然过程?由于传播过程与自生过程的不同,这类现代化起步可能会有不同的法则;又由于传播的源点在西方早发社会,这一过程又难免不带有模仿的性质,因而可能不断增加现代化社会同有的共性元素。而上述发展理论的立论基础都是现代化的“内发”,这只是一类类型的起步,并且数量极少,当今多数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在外力的影响下步入现代化轨道的,这在迟发的现代化社会极具代表性。

因此,有必要把“外发”的现代化也看成是自然的起步类型之一,它包括通过殖民入侵、战争、文化传播和贸易往来等形式,和从诱导、逼迫、学习,甚至反抗起步的不同的现代化类型。从这一立场出发,兴许能在“同”与“异”的两种极端中找到平衡。

## 二

外发型现代化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首先,外发社会不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并且同先行者间有相当的发展距离,它常常是在外界的威逼下,以被动的心态接受外来文明,借此作为改变本土社会现状的基本力量。用汤

因比的话来说，是对“挑战”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这一起步带有极多防御性的色彩，一般都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痛苦过程，有的还可能有多次的反复。

以中国为例。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还十分频繁，至少在明末清初以前，华夏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还未完全阻塞。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神父可以与中国士大夫和各级官员私下往来，当时的士大夫中，许多人对外部世界保持着好奇和了解的愿望。后来，由于发现基督教背后交杂着政治因素而立即被驱禁，西方在抗议声中悄悄退出中国的大门。康熙中叶以后，清代闭关自守的倾向比明代有进一步加强，随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学东渐”运动的失败，中外交流的涓涓细流从此几乎全部中断。

然而，就在这中断的数年间里，当中国人在自我中心的幻觉里陶醉的时候，外部世界却在发生着巨变，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开始，有的已经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到了19世纪，当西方人再度出现在中国边境的时候，它们已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武装，拥有了大大超过中国的优势力量，自然也就换上了不同于16世纪的面目。西方的挑战，一方面是全面的侵略与掠夺，同时又是先发的工业文明向非工业文明的强迫性冲击，血的教训使中国人被迫“习西夷之法”以图生存，并且从此不自觉地汇入了工业化传播的世界潮流。掀开了中国极其艰难的现代化百年史

移植外来文明与现代化过程同步，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我们的手工业作坊转向机器工厂以洋务运动为始端；我们的教育由科举到新式学院，以教会学校和外国语学堂为奠基；我们的学术由四书五经到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全凭外来的教科书和留洋者的译援，甚至包括我们的新意识形态，政治理想也是在传输过程中获得的。很明显，这种现代化很难说是起因于理性的自觉，恐怕其中自卫、反抗的成份更多，在效果上可能会掩盖了现代化的大目标，容易辨不清外来力量对本土现代化既有阻力、又有动力的双重作用，缺乏取舍应变的能力，从而作出不正确的“反应”，失去有效利用外力的良机。

第二，由于外发的传输过程需以文化知识为媒介，并且社会知识的流通范围也就是传播所能达到的范围，因而，传播型的现代化并不必然地导致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根据“知识差距假说”（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sup>①</sup>各地的发展差距完全可能进一步加大。

仍以中国为例。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大中城市及一般市镇、乡镇、村落，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时空主体，它们在知识文化的占有方面是极为不同的，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格调和行为意向，相互缺少认同感，觉得不习惯、陌生、新鲜。这种社会结构的重要功能，是把文化知识“挡”在大中城市社区中，因为乡土社会不需要太多的文化，而乡村生活也远无法走进城市文化生活，这就使得传播所能达到的社会结构层面极其有限，它主要是发生在社会结构的上层部分，确切地说，是发生在较大城市的知识群体和政治群体中，而对中国的真正实体——广大的农村社会、乡镇社会的触动是微弱的。这意味着，传播过程被限定在少数领域、未能成为有着坚实群众基础的潮流。这一现实常常蒙骗了处于传播浪潮中的上层分子，其典型例子是孙中山革命的失败。具有西方意识的革命党人在中国的构成是少数力量，他们从西方借来的政治组织观念不能同中国政治传统结合起来，移植制度的努力缺少有广泛基础的一致支持，孙中山无法有所做为。现代化只是大中城市的装饰，而不是中国社会的全部。一方面是沿海城市公路铁路的纵横交错，一方面是内地大片穷乡僻壤的羊肠小

<sup>①</sup> 这一假说由Tichenor和他的同事于1970年提出，内容是：传播信息的流入量一旦增加，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吸收信息的速度常比低者快，以致使两类人的知识差距只会扩大，不会缩小。传播发展中的情形与此极为类似。

道；一方面有“现代人的焦虑”、“自我意识”等高深的超前学术辩论，一方面又有扫除文盲，普及中等甚至初等教育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有熟练的进出口贸易，一方面又有完全排除市场规律作用的原始交换；一方面是进口和国产影片上座率的严重倒逆反差，一方面又有看电影如同过年一样少有的情况；一方面有民主与自由的强烈呼声，一方面又有百万农民为解决温饱而奔波的现实；东部与西部几乎以数年一番的绝对值拉大着发展差距——这些都是伴随传播发展而来的特有现象，而“内发”的现代化没有提供任何经验。已经有人颇具洞察力地看到了这一现实，提醒人们中国的现代化是何等的肤浅：“我们所经常接触到的现代中国只是一层薄薄的表面的装饰，轻轻蒙在一个古老文明的外部，在它的底层，旧中国仍然在半个大陆的农村里持续存在着。但是由于语言、物质水平和社会禁忌等差别，它和我们隔绝不通。我们关于它的知识必须以现代中国为媒介。这个现代中国包括受过教育的人们、铁路航空交通线、使用现代语言的书籍、从西方接收去的新观念和新气味，现代国家的技术和需要等等”。<sup>①</sup>新社会的构成者同世界文化紧密相连，但同自己社会的广大底层却渐渐疏远，这一点连许多中国人自己都难以了解。

第三，外发社会现代化的首先呼应者不是社会的下、中层，而往往是领袖集团的部分成员和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因而这类社会的现代化往往是在这批人的倡导、宣传、推动和计划下，“由上而下”施行的。这里，政治（及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同现代化内发社会极为不同，它们的经济建建立在16世纪以来长期的分化、协调和适应的积累之上，以较为成熟完备的经济、政治结构分化（及功能分化）为条件，因而，西方的工业主义必定以民间资本主义的形式发生。其基本形式是：（1）政治组织作为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独立于经济结构之外；给经济以特殊的刺激；（2）政治与经济二者合一发挥作用，但这种结构有种种办法能对政治权力加以制度化限制。这两种情况的无论哪一种，政治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都不占主导地位。<sup>②</sup>而到了日本和俄国开始现代化的时候，政治力量即开始起主要的推动作用了，俄国的彼得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这两个地区的现代化作了重要的政治准备。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都毫无例外，国家政权扮演着现代化的重要角色。政治领袖的才干、眼光及其作为所影响到的，不仅是政治局面，而且是整个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和结果。政治领导常常决定现代化的成败。相反，中产阶段——民间商人、企业家、各类知识分子等等却基础薄弱，社会经济缺少实际的承担者。这种局面反倒更加促进了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职能，使经济发展同政治的命运紧紧相联，政治的起伏对经济发展影响极大。

第四，外发社会多数有着殖民地历史。我们都清楚地记得西方的工业与科技是怎样开拓它的殖民领地的，它不是动人的、和平的，而是凶煞的、暴烈的，是战舰、枪炮、割让领土和赔款。这些损害无法叫弱小民族自觉接受。之所以近代以来这些国家不断发生反帝爱国运动，只有在民族自尊的心理现实下才解释得明白。强行的输入在殖民地人民心中引起的震撼是空前的，其结果导致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兴起。

外发社会的现代化不同程度地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潮，这一特征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主义意识不自觉地充当了部分现代化决策的依据，因为他们必须小心谨慎，避免沦于类似殖民地的地位。印度政府大力投资于化学工业部门，被外国观察家认为是“推行浪费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在这一决策里起作用的是民族主义，而非经济学，印度

<sup>①</sup> J.K.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1958年, 第6—7页。

<sup>②</sup> 参见T.帕森斯: 《发展的挑战》,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 1976年。

政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立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20世纪在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其中的成功和失误，几乎都无法排除民族主义意识的暗中作用。<sup>①</sup>民族主义在这些社会所产生的后果极其复杂，它既是早期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之一，又是传输的制约力量，既是一种动员民众的有效内聚力，又容易使保守主义情绪在它的掩护下活跃起来。

上述这些特征肯定不够全面，但它们足以使我们看到了外发现代化社会起步的艰难曲折：它处在外来的现代化共性和个性的张力之间。这一处境决定了我们必须有效地辨别、选择它们，了解哪些是非学不可的，哪些是要坚决抛弃的。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是避免发展失误的前提。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严立贤

## 华北农村研究中心简介

华北农村研究中心是一个民办的研究机构。她是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的倡导下，在河北省委、保定地委、行署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在保定成立的。她的宗旨是：研究农村，开发乡镇，促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中心也力图探索一条自筹科研经费，自负盈亏，不吃“皇粮”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 new 路子。

华北农村研究中心以自主研究、助成研究和委托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式。虽然中心没有一名专职的研究人员，但是大家协助同心，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农村乡镇，深入工矿企业，调查研究，努力用自己的才智为科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应当作的贡献。在中心成立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出版《农村研究文集》两卷，发表各类报告和文章100多篇；同时出版《乡镇企业厂长必读》，《现代农业经济管理概论》，《社会心理学词典》等著作。另外正在编辑《社会科学便览丛书》和《当代应用心理学丛书》各一套。同时还配合农村读物出版社组织编辑《中国乡村面面观丛书》中的10余本。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有：“保定、石家庄等地职业流动和职业评价的研究”、“定县农民家庭调查”等。三年来为河北培训“方志”和“社会学”人员1200余名，与山东大学中文系美学所合作培训美学人员100余名。

华北农村研究中心的全体人员愿意和全国的同仁协手合作，共同为推动科学的发展，为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华 心)

<sup>①</sup> 参见(美)塞利格·哈里逊：《扩大中的鸿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